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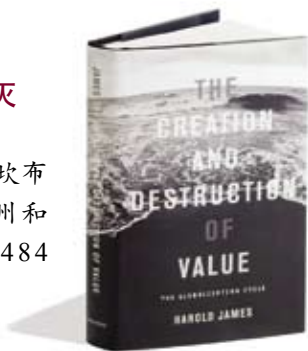
## 卡珊德拉的又一次预言

Harold James 著

### 价值的创造与毁灭

全球化的周期

哈佛大学出版社，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和伦敦，2009年，484页，35美元(精装)。



Harold James对全球资本主义持悲观态度。在他2001年出版的《全球化的终结》一书中，他记载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在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方面的每一次历史性努力是如何最终走向失败的，其原因又是什么。全球化增加了世界的福利，但许多群体却受到它的威胁和伤害，而其产生的反作用超过了另一些人从中获得的收益。Harold James的言下之意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伟大的全球化进程也注定难逃崩溃的结局。

正如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笔下的预言者卡珊德拉那样，James是正确的，但他的观点被忽略了。当20世纪90年代至新千年初期资本流动高速膨胀时，全球化的收益并没有以其应有的方式被广泛分享，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开始凸显，并且不断恶化。对大型金融机构监管的严重不足导致其所承担的风险超出了控制，而这没有引起任何及时有效的回应。官方阻碍一切贸易与金融扩张和劳动力标准与自然环境保护的联系，或阻止工业化国家市场向来自穷国的进口品的任何有效开放，这导致了剧烈的反全球化风潮。即便如此，前进的力量仍无所畏惧地继续推进。是什么将阻止不受约束的全球金融继续扩张？并非只有一个评论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国际金融架构……已经证明其适应全球经济变化（往往

是迅速变化）的能力”（Boughton, 2002年）。鉴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的经济崩溃，这种乐观论调似乎不太有说服力。

在这本新书中，James并没有吹嘘他的预见性。他有更大的雄心：以约瑟夫·熊彼得的“创造性毁灭”（资本主义的根本驱动力）这一概念全面透彻地解释为什么全球化总是遭遇失败。熊彼得的观点是“经济进步的动力来自产业突变……它不间断地从内部变革着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熊彼得1950年在原稿中这样强调）。James的观点是，创造性毁灭破坏了进步所必需的真正价值。创新和增长取决于金融，而后者会造成阶段性的、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从这个角度讲，“银行、企业甚至个人都将不再相信他人……货币和理想的价值也被动摇”。

James通过环环相扣的6个章节发展了这套理论。首先，James总结了他在早前关于永久的“全球化的周期”（在过去两年的经济崩溃中表露无疑）一书中深入探讨的历史案例。第二，他认为我们已经将本次的“大衰退”类同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相较1929年的情形（不合理的金融市场），前者从根源上看更像是1931年的状况（危机的全球蔓延）。第三，他详细描述了关于本次衰退如何开始的令人心情沉痛的细节，重点关注于2008年的两个“创造历史的周末”：当年5月对贝尔斯登的救助和9月关于放弃救助雷曼兄弟的决定。后一个决定的目的是证明救市并非不可避免。其所产生的效应摧毁了所有人对金融稳定性的信心，以及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信任。

在第4章中，James开始提出解决方案，并且得出富有争议的结论，即金融监管并不是解决之道。尽管“对金融紊乱的传统回应是施以更多的监管……更好的答案……总是似是而非地掩藏在进一步的技术变革中”。具体地说，他坚信“金融知识的透明度和传播普及”将使我们成为全球金融的专家，而不是奴隶。

第5章同样引发了争议，James在这一章指出，抛开其他不谈，鉴于美元的贬值，中国迟早将抛弃美元。尽管宏观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同样从稳定的美元和稳定的体系中得益，但James提醒我们，理想化的经济情境并不能总是驱动历史。

James的博学广识及作为一代金融史学大家所展现的才华在最后一章显露无疑，在这一名为“价值的不确定性”的一章中，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货币价值与关于这些价值的知识所遭受的破坏，以及理想、信念和信任的削弱之间的联系。“的确，企业伦理的丧失摧毁了金融全球化的模式。”

卡珊德拉如今对我们有着怎样的警示？当再次启程时，我们必须首先重新赢得信任，并且找到“美德的汇聚”。发现这种美德并非易事，而且旷日持久，而当我们成功时，所获得的唯一收获就是全球化周期的又一个轮回。

James Boughton  
IMF历史学家

#### 参考文献：

Boughton, James M., 2002, "Review" of James (2001),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4, No. 4, pp. 923-25.

James, Harold, 2001,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umpeter, Joseph A., 195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3rd ed.).

## 不再是“发达”经济体

Carmen M. Reinhart和  
Kenneth S. Rogoff 著

### 时过境迁

金融部门犯下愚蠢错误的8个国家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  
林斯顿和牛津，2009年，  
463页，35美元（精装）。



2005年，国际清算银行冷冰冰地评价道：“不断上升的国内和国际债务已经创造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条件”。一年之后，Anne Pettifor在《即将来临的首次世界债务危机》中预言：“所谓的第一世界将陷入债务水平的泥潭，而这一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严重困扰着所谓的第三世界。”

在非理性繁荣的海洋中，在被遗忘的历史里，在蔓延的贪婪情绪下，只有上述以及其他少数孤独的声音是正确的——而世界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在过去的10年中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主权违约。他们已经汇集了跨越8个国家的数量惊人的数据——覆盖了银行业危机、国内和外部债务违约、本币崩溃，以及66个国家的通货膨胀。Reinhart和Rogoff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危机表现为一连串的现象——主要归因于诱人的“这次与以往不同综合症”，无论过去和还是现在，我们中的流行观点是：旧有的关于变动的经济法则不再适用于当下。他们雄心勃勃的金融危机定量历史勾勒出了（跨期、跨洲际的）金融危机之间、通货膨胀与国内债务、货币贬值及外部债务违约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些违约很少是二进制事件：部分违约或拖延违约较为常见。即

便这些工具被替换，政府也很少充分偿还其债务。大多数“新兴市场的巨额外债削减最终形成债务重组或违约”。

在对金融危机进行归类之后，两位作者将注意力转向主权外债危机。他们阐述了

了主权债务的基本经济学理论，并描绘了区分主权债务和公司债务的特征。舰炮外交据说将在成本一效益测试中失效，但没有人提到强行征收在国际法下同样也是非法的。

Reinhart和Rogoff将外债定义为“一国对外国贷款人的总负债”。国内债务是指所有“政府发行的、受制于国家管辖的债务负债，无论贷款人的国籍和债务主导货币为何者”。在这些定义下，国内发行并由外国贷款人持有的主权债券既被视为外债，也被视为国内债务。这种重叠解释了外债和内部债务的界限为何日益模糊，因此我们需要对其做出进一步界定。

接下来，Reinhart和Rogoff将注意力放在国内债务被遗忘的历史上。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研究结果是：现代对短期债务的偏见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滞胀”的产物。相较于外债，国内违约只有在更严峻的宏观经济条件下才会发生，而拥有充足国内储蓄的国家可以将国内债务作为外部借贷的替代。作者认为，通胀是国内债务违约的默认形式，在通胀伴随着金融衰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他们解释了为何当外债看上去还保持在可持续的水平上时，高水平的国内债务可能最终违约。

他们重新审视了经济增长将使国家摆脱高债务水平这一普遍观

念。逐渐脱离连续违约俱乐部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中途退出的几率很高。银行业危机对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是“同等几率的威胁”，其发生的频率惊人，在世界的金融中心情况更是如此。而且这种危机的再犯率甚至更高。关键的研究结果是，现代银行业危机导致实际政府债务平均上升约86%——绝大多数是间接的，由降低的经济产出和削减的税收收入引起——其通常超出了按照重要性等级进行救市的成本。“银行业危机的真正后遗症是公共债务的提高”，其已经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银行业危机后果的决定性特征”。

两位作者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不断积累的债务中所谓的无害特征提出质疑。他们指出，2004—2005年间美国“已经吸收了超过2/3的”的所有财政盈余国储蓄的美元。历史重演了。再一次地，“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这一观点占了上风——这种观点给了美国政府、消费者和公司一张没有清算日期的空白支票。

Reinhart和Rogoff整理的证据表明了发展和发达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共同点。但他们排除了“夸张”的逻辑结论，即发达经济体将很快在金融角度上与发展中经济体难以区分。在其看来，美国依旧是“高度发达的全球金融中心”。而2009年西蒙·约翰逊在《大西洋月刊》上雄辩地指出，美国为了减轻负担已经出现沦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可能。对发展和发达经济体的旧有分类可能将在本次危机之后不复存在。

Michael Waibel  
剑桥大学国际法学院劳特派特中心  
博士后研究员

## 对可怕的贫困的极端衡量

R. Glenn Hubbard和William Duggan 著  
援助困局

关于终结贫困的严峻真相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2009年，198页，22.95美元（精装）。

《援助困局》的作者R. Glenn Hubbard和William Duggan均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他们在书中对如何终结极端贫困提出了根本的解决办法。作者相信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援助和非盈利组织的现行体系令穷人依旧贫困，而消除极端贫困的唯一可持续的方法就是振兴商业部门。

传统上，面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援助被形容为采取两种形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援助困局》的作者发现两种方法都失效了。自上而下的援助常常流向了政府，被腐败的领导和官僚所贪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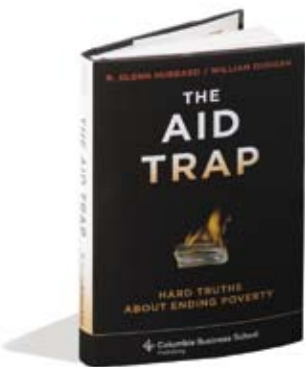
自下而上的援助提供了免费但不可持续的服务，这造成了依赖性，还挤出了市场驱动的商业。作者以千年发展目标以及相关的“乡村发展项目”为例，两者目前是最受欢迎的援助，但最终还是将受制于自下而上援助的分配问题。

作者称赞了有利于商业且广受欢迎的小额贷款的兴起，不过他们认为小额贷款也有其局限。微型企业通常始终保持微型的规模，这常常是因为其成长收到政府的削弱，后者惧怕商业驱动的繁荣将导致外国援助的枯竭。

Hubbard和Duggan建议基于马歇尔计划（其曾成功地恢复了二战后西欧遭受重创的商业部门的活力）采取另一种方法。Hubbard和Duggan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现代版马歇尔计划将为当地企业提供贷款，前提是政府同意改革其商业压制政策。这些贷款未来将偿还给当地政府，接着政府可以将其用于对

基础设施的再投资，从而进一步支持商业发展。商业部门的发展将增加收入税，后者能为关键的社会服务（如卫生保健和教育）提供融资。

作者并不讳言他们的计划是对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的一剂“猛药”。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选择或放弃任何形式的援助（除了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富裕的国家将不得不采取支持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政策。这将有可能会消除补贴，例如消除针对生产过剩农作物的美国农场主的补贴（作为面向穷国的粮食援助）。



在短期，相对更强大的外国企业，当地企业将受到更多照顾。但是最终，穷国会发展出繁荣的商业，其将允许一度更加强大的外国企业回到它们的市场。

从理论上讲，这个计划是可行的。但这里存在困难：在需要穷国和富国都做出广泛牺牲的情况下（即便这种牺牲是短期的），没有一种计划能够以其原有的形式存在。

在开篇，作者以本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为例，阐述了商业部门在重建金融稳定性方面的能力。“我们看到了关于繁荣国家的全球共识，即兴旺的商业部门是国家繁荣的源泉，各国认识到当地企业是未来为其大多数民众提供报酬优渥的工作的唯一希望。这些国家正在

采取大规模政府措施，其并非是要取代商业部门，而是恢复它。”

引用最近的事件作为商业如何消除贫困的证据会带来某些问题，即其忽视了商业部门同样是造成了此次经济危机的因素，而这次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上数百万的工作岗位。

是的，商业不是万能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发展项目也不是。当然，自上而下的援助仅使少数人中饱私囊，而非为大多数人创造机会，所以这也肯定不是问题的答案。

最终，答案将如同社会 and 人类本身一样复杂。当世界上希望且需要终结不人道的极端贫困的民众数量到达一个公认的转折点时，极端贫困将被终结。那时，也只有那时，极端贫困问题将在一个具有广泛基础且多管齐下的方案下得到解决，不但满足了各个发展中国家和乡村的需要，还能满足各个家庭的需要。

没有任何单一的宏伟计划能够终结贫困。这其中注定产生波折，时好时坏，而且旷日持久。其将很像部分的马歇尔计划、部分的千年发展目标，以及部分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援助——以下都是有利于补救措施的关键环节：有利于商业的政策、卫生保健、人道主义援助的大范围分配、对不断蔓延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令微型企业自由发展壮大的开放的、有利于商业的市场环境。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为Hubbard和Duggan的大胆设想喝彩。他们勇于面对社会中最大的挑战——极端贫困——并构建了变革的实际模式。这是对解决方案的巨大贡献。

Wendy Smith

《给一点爱：你的一小笔捐款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一书的作者

## 公平的游戏

Simon Kuper和Stefan Szymanski 著

足球经济学

Nation Books, 纽约, 2009年, 336页, 14.95美元 (平装)。



你为今年夏天在南非举办的世界杯做好准备了吗？你知道一个国家的收入、人口和足球经验是一支国家队能否突破世界杯首轮的主要决定因素吗？不要迫不及待，检查一下你最喜爱的国家队的情况。上述三个因素只解释了25%的目标差异变化，剩下的75%是不可解释的随机噪声或纯粹的运气——这就是计量经济学对此的研究成果。

在《足球经济学》中，《金融时报》的作家Simon Kuper和杰出的体育经济学家Stefan Szymanski探讨了上述以及其他令人惊奇的事实。在这本关于世界上最受欢迎运动的妙趣横生的书中，他们将学术分析与全世界足球运动员、经理人和球队的轶事熔于一炉。通过罚点球学习博弈论或足球案例学习回归分析将令研究生的经济学课程变得更加有趣。

像雷曼兄弟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和足球俱乐部有什么共同点？其又是怎样得到区分呢？它们都受制于道德风险（没有受到惩罚的冒险行为），因为它们通常会得到救助。不过这并不总是成立，就像前几年雷曼兄弟的遭遇。但令人惊讶的是，足球俱乐部很少会消失。是的，有些俱乐部可能会破产（如佛罗伦萨和利兹联队），但Kuper和Szymanski认为，足球俱乐部可谓是最为稳定的经营项目之一。即使少数未获得救助的俱乐部（如佛罗伦萨）也常常在获得资金后以新的名字重新出现，而且拥有和原来相

同的球迷，并以极快的速度重返最高级别的联赛。尽管在好年景时，银行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足球俱乐部却通常无利可图。两位作者没有发现联赛排名和利润之间的相关性。而且出人意料的是，足球运动员的收入几乎完全解释了英超联赛排名的所有变化。但下次你所支持的英国球队宣布一桩耗资数百万英镑的“年度转会”时，不要过于乐观：特定的转会与球队接下来的联赛排名并没有必然联系。

从书中我们还知道，举办世界杯或欧洲杯减少了欧洲国家的自杀率；挪威显然是欧洲最富激情的足球国度；伊拉克是世界足坛最大的黑马；而半数的英国球票持有者不会在下一赛季保留他们的座位。除非银行倒闭，否则其客户通常不会换另一家银行，但足球迷似乎并不那么忠实。此外，举办这些赛事无法产生任何利润或带来多少经济效益，但它确实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这是来自幸福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所以即使南非有可能在即将举办的世界杯中赔钱，但其会在这个秋季成为更加快乐的国家——更不用说其他参赛的非洲国家将可能从南非世界杯中受到激励，收获自豪感和快乐。

本书的局限性在哪里？那就是经验证据有时过于集中在英国。经济学家通常会对某种结论提出质疑（可能不包括谈及理性预期或有效市场的时候），所以来自其他国家的更多证据必然将有助于归纳出部

分的结论。同样，通常而言，关于为何穷国在体育方面做得更糟的解释——营养匮乏、疾病肆虐、网络的缺失，以及组织问题——较为流行。但这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非洲国家在国际足联的U17和U20世界杯上表现出众。尼日利亚队是除巴西队外最成功的U17国家队，共获得三次冠军，而加纳在最近的U20世界杯中夺冠。

“举办这些赛事无法产生任何利润或带来多少经济效益，但它确实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对全球化的支持者而言，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和印度等国何时能在足球领域中取得成功。反观同为金砖四国（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巴西却有着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队，而俄罗斯在两年前的欧洲杯中获得亚军。

最后，对拥有大额预算的球队经理提出一句忠告：不要引进在南非世界杯中大放异彩的球星。他们倾向于被高估。应该购买的二十出头的球员和那些你能解决其个人问题的球员（他们都倾向于被低估）。

《足球经济学》不仅将受到足球迷的高度评价，还将受到所有希望将经济学工具运用于精彩的足球世界的人的欢迎。

Heiko Hesse  
IMF经济学家，前多特蒙德队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德国纪录片《Die Champions》和《HalbZeit》（即将播映）的主人公